# 当我们想念电影院时

张 胤

上海电影节终于如约而至。

还记得上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吗？电影院复工后，你最想看哪部电影？这也许是我这几个月以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电影，从未像现在这样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消遣。情侣约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单身狗消磨时光去电影院看电影，宝妈宝爸带娃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里的一方天地承载了我们的欢乐与记忆，也在不断制造新的回忆。导演杨德昌说，“电影发明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延长了至少三倍。”若说电影以一种超验性的人生隐喻，为我们直白地展现那生命蒸腾的丰沛世界，那么电影院，这处特别的场所，更在展现的同时，提供我们在匆忙纷杂生活中暂时遁迹的隐秘树洞和堡垒。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空间里，跟着主人公置身于他者的人生中，两个小时之内可以尽情成为任何人，可以安心地造自己的梦，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颓丧的、快乐的、勇敢的……仿佛都能拥有。

一直以来，相比富丽堂皇的电影院，家附近商场顶层的影院，才是我的偏爱。每逢周末，一遇到好电影，我就会选择找个安静的下午场或静寂无人的晚场，坐在末排座位上独享，如同孤身一人潜入到了地表深处某个角落。太宰治曾道出，“电影院是意志薄弱的人暗自饮泣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意志里脆弱的一面可以暂时被妥善安放，获得一种内心上宁静和自由，就像卸掉重重的包袱，等待被治愈、被抚慰和沉淀，而后轻装上路。

广西作家朱山坡在他的新作小说《蛋镇电影院》里，把自己对于电影和家乡电影院的特殊记忆，写进了一个个温情故事中，以对童年电影院的怀念贯穿始终，离合与悲欢，宽容与仁爱，潮湿而斑驳的记忆，在每一次回眸中串联起小小的一个个缩影，在时代的光影里熠熠生辉。“有时候一张电影海报像战时的捷报，能让整个蛋镇陷入无比亢奋的期待之中”“在昏黄的街灯中，我们看到孙吴骑着车，背着胶片，从芒果大街那头向电影院驰骋过来，像草原上狂奔的野马，像从高山冲下来的猛虎。”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一个故事里看到自己。而那些与电影院互动的闪光时刻，往往能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和生活的记忆，便是电影院在点滴平淡生活中所承载的意义。

这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导演托纳多雷的著名电影《天堂电影院》。同为偏僻而贫穷的小镇，对于40年代的意大利西西里小镇，电影院就好似天堂般的存在，俯瞰着苦难的尘世，使人们得以超脱现实的艰辛。电影的结尾处，坚守电影理想的多多目睹被拆毁的电影院，噙着泪水却露出了微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即使时过境迁，即使电影院已不复存在，蕴藏于内心深处那份清澈纯真的感情，将一直镌刻在脑海里、在心里，为我们保管着人间最美好的一切。

随着电影落幕喧嚣散尽，人们纷纷离场，像是在河床上偶遇的船只，稍稍停泊后又驶入了各自航道。当我们在想念电影院时，我们在想念什么？是夏日的黄昏里满溢奶香味的爆米花。是和不相熟的人一起落泪一起大笑。是走出影院时那氤氲在空气中飘浮久久的水汽——或许都是吧。看着人马车流日渐回归庸常，连天小雨稀疏落在清冷的石阶，念起那个如此临近又一度如此“遥远”的地方，不由生出淡淡感伤——而今又欣然。

# 动机动力

## ——求学十部曲（之十）

邓伟志

求学的动机就是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自强不息的动力。责任和担当的力度取决于动机的纯度。动机是读书、求教、思考、创新等上述九部曲的总开关。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是对求学的起码要求。说实在的，如今有些人的求学动机不如20世纪50年代，至少有两个“旁骛”：一是追求发财，二是追求当官。这两个“旁骛”严重妨碍了学习。以教子出名的颜之推说：“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在求学时期，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腰缠万贯进出图书馆很不方便，何必自找麻烦呢！近30年来，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与可能录用人数之比为报考大学人数与可能录取人数之比的几十倍，有的岗位甚至于达到上百倍，这很不正常。我曾摹仿一所学校，为学者写了副对联：“要想发财莫进来，追求当官走别路。”我这样写，是经过思考的。以色列曾请爱因斯坦当总统，被爱因斯坦拒绝；而提出三大定律的牛顿，后来当了厂长，从此在学术上一事无成，原来的学术成果也部分被颠覆。

真心求学的青年应当心系家国，甘于奉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创新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让自己闪耀的青春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让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党中央号召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为人民做学问”，才是崇高的动机，才是高远的价值追求，才有无穷的力量，也才能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时光宝贵、青春宝贵，希望大家珍惜韶华，用奋斗给青春涂上靓丽的底色，用勤奋绘就壮丽的人生蓝图，尽早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擎天之柱！（完）

# 雨记

张 猛

对于一个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像我这样的鼻炎患者，现在就特别喜欢下雨。天地之间，到处都充盈着润湿的空气，可以抚慰我敏感干燥的鼻子。所以，我对雨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丝毫不逊于那些在久旱干涸的土地上翘首以待的农民。

未经泥土洗浴的人生无法理解雨的情深义重。

老百姓常说，种在地里，收在天上。这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雨，雨生百谷，所以二十四节气中有一个是“谷雨”。“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雨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年年如是，生生不息。

小时候在乡村，我深知土里刨食的人对雨的敬重。那时常听我姑父提起“几龙治水”。姑父多少懂一点五行八卦，家有喜事，结婚、乔迁……都是姑父帮看日子，来满足我们心中那些若有若无的小迷信，完成岁月中有些必不可少的仪式。

开始，我对“几龙治水”一脸茫然，那时“百度”还没问世，我也没读几本书，当听到“龙多靠，龙少涝”的俗语之后，才好像明白一点，龙的多少决定了旱涝收成。在对龙充满敬畏的同时，也渐渐有了一丝不屑，那么圣灵的东西，怎么可以像人一样推诿扯皮不负责任？

当绿油油的苞米苗子从土里钻出来，如果十天八天不下雨，地就冒烟了。于是，人们就开始念叨雨，但是那种断断续续的零星小雨没人稀罕。一下这样的雨，我奶奶就要发出那句永不变更的感叹：“这是给虫子点眼睛呢？”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的语言有多么文学。

说起雨，我奶奶曾经三番五次地给我讲一个夏天的故事。

那时我大概还没上学，奶奶领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回娘家。从我们住的祁家窝棚到奶奶的老家炮屯有二十多里，奶奶领着我们“走毛道”（小路），身边是漫无边际的青纱帐，没想到遇上了一场豪雨。只听奶奶说，那场大雨下得沟满壕平，而且下了鸡蛋那么大的雹子。奶奶一手一个，领我们跑到一棵树下，把两个小脑瓜儿揽进她的怀里，任凭雹子往她身上砸。不知下了多久，地上水流如注，奶奶说，她看见好多被砸死的燕子，顺水漂走了。那时她忘了满脑袋的大包。真是一场恐怖的雨，奶奶每次讲起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气象。

我见过的第一场最真切的大雨是在我们家苞米地里。我当时上初中，和父亲到“树地”铲地。我们屯子有好多片地，都有简单形象的名字，什么北长垄子，大齐坟，二节地，抹斜子……“树地”和我家隔着一个叫“果树园子”的屯子，中间大概有三四里路。“果树园子”是祁家窝棚的附属屯，只有两栋房子，几十户人家，每次从那里穿过我都有一种夜郎自大的膨胀感，就好像那里很渺小，而我则来自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

那天热得好像下了火，无边大地上有或远或近的人影，都在缓慢地重复着一个动作。远方不知是地气还是热浪，在虚无缥缈地闪烁、流动，好像海市蜃楼中的河。我远远落在父亲后边，眼睛紧盯着哪根是草，哪根是苗，长长的锄头连铲带刨，送出去，再拽回来，机械枯燥地向前挪。不知过了多久，猛抬头，终于看见一片乌云。又不知过了多久，有凉风了，然后，那片越来越黑的云迅速压过来，天地间出现一条白亮的雨带。等我和父亲扛起锄头往家跑的时候，耳边已经响起噼噼啪啪的雨声，由远及近，狭路相逢。凄风冷雨，浇得人透心凉，但我对它充满感激。它让我暂时离开我憎恨的土地。

奇怪的是，当跑过“果树园子”村，眼前却是另一个世界，土路干巴巴的，一滴雨都没下。这时，父亲被我远远地落在后面，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感叹着，“隔道不下雨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一场雨的渺小和大地的广博。

假 日 水彩画 荣德芳

# 『编辑房间肉一方』

祝淳翔

唐大郎18岁时，来沪入外滩中国银行当练习生，住在德国总会（中行旧址）五层楼上达七年之久。一早起身，便跑到外滩，看到小报就统统买下，边走边读，乃至买碗牛肉面边吃边读，逐渐养成习惯。读报日多，不觉技痒，见到冯梦云脱离《小日报》办起《大晶报》，也投稿过去。梦云见其文章芊丽，大有爱才之心，于发稿之际，常写按语以示鼓励，还写信恭维他，信中有诸如“一年不辍，必负盛名”的句子。就这样，大郎为虚名所惑，虽无稿费，亦笔耕不辍。有时兴会所至，一天写上六七稿，俨然《晶报》上的包天笑。

等到1933年，大郎因意气之争脱离银行，一时找不到好工作，遂正式下海成为职业报人。大郎个性奔放，笔端嬉笑怒骂，有时不免误伤文友。这里爰举一例。卢大方《上海滩忆旧录》里有一节“第一枝笔唐大郎”记有一段故事，说是：一位老友有个红颜知己王小姐，她过去出身不高，但认识吾友后，矢志相爱，力争上游，友人也促使她从事电影事业，以期成为一个演员。这本是一桩好事，王女过去曾认识上海著名律师王黼裳，王氏拟量珠为聘，女以齐大非偶却之，时吾友亦兼主一家小型报辑务，工作时女时来相伴，乃有红袖添香之概，此事原与大郎无干，不想大郎忽在自己所辑的报上，刊出了一首诗，对王女大肆调侃，句云：“编辑房间肉一方，人言此是密司王。屠门不走登银幕，依法何如适黼裳？”一个正在力争上游的少女，突然被人揭发了她的痛疮疤，心里真不知是怎么难受，朋友见了，也是啼笑皆非，但诗已登出，无法收回，朋友至此不发一语，只写了一张便条，托人送达唐的报馆，便条上书云：“云旌先生千古，某某某谨挽。”表示双方划地绝交，两人因此断绝往来很久。

卢大方即唐大郎投身新闻事业的早期搭档卢溢芳，而与大郎绝交的老友是谁呢？一开始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年唐大郎在《东方日报》编副刊，但该报馆藏缺损严重，并没有发现那首诗。直到录文渐多，终于在大郎两篇随笔的夹缝里见到了编者按语，谜底才揭晓。

先是在1936年12月7日《铁报·将近狼年斋碎墨》，大郎谈及骂人，说“陈蝶衣兄尤雅工此调，半狂兄曾为之啼笑皆非，然此皆不失为蕴藉，若愚之骂人，则讲究痛苦，生性使我不惯作皮里阳秋也”。此时，陈蝶衣“突施冷箭”，插话说：“在下纵工此调，然未尝敢施之于云裳，若云裳则‘编辑房间’之辣手文章，早使在下啼笑皆非矣！”又见1940年10月2日《小说日报》，陈蝶衣在大郎《云裳日记》篇中驳斥道：“足下忘‘编辑房间肉一方’之时乎？何尝为故人稍留余地哉！”显然是余怒未消，一直耿耿于怀的。这也就能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要办两张小报了，因为唐陈两位素有积怨，难以合作愉快。

# 七百岁真如今“生日”

小 覃

真如，本佛家语，意为事物之本相。《成唯识论》：“‘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为，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元延祐七年（1320年），妙心和尚迁建真如寺于桃浦河、梨园浜交汇处东北角，史载，“真如镇，以佛寺名”，真如从此诞生。2020年，迎来了真如诞生700周年。那具体哪一天算是真如的生日呢？

真如寺，宋代建于官场（今宝山区大场附近）。嘉定年间（1208—1224年），僧永安改建，名真如院。元延祐七年（1320年），僧妙心移建于桃浦边今址（兰溪路），改名真如寺。今真如寺内大殿额枋下保留有移建时的题记：“时大元岁次庚申延祐七年癸未季夏月己巳二十乙日巽时鼎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刘义勇释文，每季的第一个月叫孟月，第二个月叫仲月，第三个月叫季月。“季夏月”，意思是夏天的第三个月，即六月。刘教授又联系到专门研究古代史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刘江。刘江博士查阅《二十史朔闰表》后进行了核算：阳历7月7日对应的阴历是六月初一己酉日，六月二十一日就是己巳日。“乙”是“一”的通假字，就像“太乙”通常写作“太一”。因此，700岁的真如的“生日”是：1320年阴历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27日。

# 在上海学垃圾分类

潘朝阳

时 尚

端午期间，我和妻子到上海探望孩子。小住几日，发现上海生活起居与我居住的城市南宁大同小异，唯独在垃圾分类方面印象深刻——上海已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了。由于南宁目前暂未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我在上海习惯性地按南宁的分类方法处理垃圾，因而碰撞出一些小火花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孩子在南宁长大，尽管他到上海工作了几年，但是家乡的美食还是他的最爱。于是，袋装南宁老友粉，冰冻的土鸡、黑山羊肉，还有端午节必备的凉粽，塞满了我们的行李箱。到上海打开箱子，孩子立即泡了一碗老友粉。他三口两口吃完粉后，长呼一声“爽——！”孩子妈妈听了很有成就感地乐坏了，高兴之余她顺手将剩下的料包袋扔进垃圾桶里。孩子一见，突然认真地对我们说：“老爸老妈，在上海垃圾要严格分类！共分为四类：湿垃圾，指食材废料等；可回收物，如包装快递的废纸箱等；有害垃圾，废旧电池等；干垃圾，指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他接着举例说：“老妈将料包袋扔进湿垃圾桶里，分类错了！尽管袋里装的是食材，但袋子本身不是易腐的食材废料，因此不属于湿垃圾。另外，料包袋太小不宜作回收物，因此也不属于可回收物，通过排除法得出结果是干垃圾，应扔进干垃圾桶才对。”啧啧，我和妻子听得直吐舌头。

次日一早，我也犯错了一回。我泡一壶茶，自斟自饮，悠然自得。茶叶泡了几遍后，已淡然无味，我小心挤干茶渣，将它扔进干垃圾桶里。孩子无意间看到后，又一声不吭地从干垃圾桶里拣起茶渣，再扔进湿垃圾桶里。我一边内疚，一边暗忖：老友粉的料包袋为干垃圾，为何茶渣却归为湿垃圾？听儿子解释后才明白：料包袋与茶渣的区别，在于后者为易腐的食材废弃物，因此属于湿垃圾。

这么几次令人记忆深刻的实践之后，我和妻子就摸出门道了。当我再斩家乡的白切鸡时，已能正确地将鸡屁股扔进湿垃圾桶里。妻子直叹气从南宁大老远带来的土鸡，那肥美的鸡屁股被扔掉怪可惜，要知道这在乡下可被老人当

七夕会

做下酒美味，一碗土茅台一只鸡屁股啃得老嘴吧嗒吧嗒响。

在家里已经严格进行垃圾分类，没想到去小区集中倒垃圾时却还是遇到问题。我第一次去，将湿垃圾连袋扔进桶里，在一旁的收垃圾工作人员立即纠正：不能连塑料袋一起扔进去，被污染的塑料袋应该扔进干垃圾桶。我硬着头皮从湿垃圾桶里扯出垃圾袋，再扔进干垃圾桶里。洗手之后心里还直发毛，这分类做得也真够细致的！

在沪期间，我还看到《新民晚报》某日推出了特刊，全面报道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果，其大标题为“垃圾分清爽，城市更清爽”。这正是我在上海几天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受。